

「生科舉時代，不能由科舉出身；作文章工夫，那得有文章名世。」這是祖父在八十八歲時所作〈第二庚子自述駢言〉的開卷語，寥寥數語，道盡了晚年的心境。家父曾詳細地為我和家姊印連講解，也是我認真細讀祖父的第一篇文章。在晚清良莠不齊、貪婪混濁的官場裏，祖父仍能和而不流，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隱隱然有大儒之風，一如其自述所言「卻諸公袞袞之多儀，預杜賄交於三節；勵一介硜硜之素行，非同神話之四知」，為兒孫樹立一個崇高的典範。

祖父一生淡薄，律己甚嚴，清茶淡飯，習以為常。每日二餐，五更早飯，以菜飯為主，間添半隻鹹蛋。二餐都是獨自在房內食用，書桌即是他的飯桌。祖父大半生都在專注寫作推敲中，自得其樂，家父有詩記云：「伏案不為疲，蠅頭朝至夕。足罕履戶庭，市廛更稀覿。」每有客到訪，祖父一定衣冠整潔，戴上帽子，親自迎迓。鞠躬送客時，必目送客人遠去始回。若遇我們在廳玩耍，亦必命肅立在其身後送客。

祖父家教嚴厲，親自督教子女讀書習字，每用油燈檢視子女毛筆字有否填筆，若有填筆，必須重寫。凡所授詩文，第二天都得背誦。所以幾位姑母、叔伯寫得一手好字，國學根基尤為牢固，更將家教承傳下去。當我念高中一時暑假，家父特別抽空教授我及家姊二人《左傳》和唐詩，家父背誦原文，並加解釋，瀟灑自如，我們則執書恭誦。祖父為人很傳統，只教子女讀書，課孫責任落在子女身上。我們生逢二次大戰之後，百物蕭條，父輩皆為生活奔波整天勞頓在外，我們亦無法得沾祖父的文采。不過，在我約四歲時，家人請了一位老師為我「開筆」，其時祖父身穿長衫，頭戴卜帽，肅立欣看，並賦詩紀事云：「勞動逢佳節，髫年鼓篋時。授經吳季子，（延吳紫銓秘書為之啟蒙）荐俎孔宣尼。救國今科學，興宗夙厚期。勉旃成宅相，太素笑開眉。」

小時候，我們曾與祖父同住，及長雖已遷居另宅，但每逢週末我與家姊都會徒步去看望祖父，直至我跟母親離粵赴港與父團聚為止，從此再也沒有見過祖父。居港後，常聽大伯父及家父暢談祖父逸事，當時家父與祖父雖隔二地，見面無緣，但彼此書信往返從未間斷。遠在一九六零年，祖父已開始從廣州寄手稿給家父校對和印刷。從祖父家書中可見其對印書要求甚高，例如註明用八十磅書紙，排字度，內文用五號字，每隔七個字空一格、排五欄等等，都寫得一清二楚；甚至所用油墨亦希望能夠盡美，尤其盛讚家父所印〈第二庚子自述駢言〉云「收到紅字駢言四十三本」、「印得極好，紙張又好，人見人愛」。不過，當時兩地經濟維艱、生活拮据，家父所能做實屬有限，祖父亦在家書中謂於廣州出版的《一廬文詩聯選存》費用一百五十餘元，俱由友人資助。家父所藏祖父手稿眾多，仍因當時財力有限而無

法付梓，僅能以抽印或油印形式寄呈祖父，盡量滿足祖父印書的心願。如先後兩次為祖父印製〈小山鳳頂格詩鐘〉數百聯，祖父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收到父親寄出的第一版一百多聯的詩鐘後，高興說：「我今日收一百六十四聯詩鐘，擇其好者，抄得一百一十一聯，人人見之有譽無毀。」又另一函說：「如此詩鐘，安得不印。九十餘歲老人，作此。」祖父於一九六六年再完成二百四十聯詩鐘，喜極，囑父親續印，在函中說：「今於大病後，續作二百四十聯，此乃古今未有之奇。」又於另一函中說：「此係我精神復元，記典之記性不失，增此以成傑作。非催促印刷也。小山詩鐘之傑，銳兒（家父字「銳之」）前交香港大學教授識者閱之，驚為傑作，非我夜郎自大也。」祖父對詩聯的喜愛，略見於此。可惜當今社會，熱愛中國古文學之士已日漸式微，以洋文為主的香港社會更難覓知音。家父在給祖父的信中亦曾慨歎在港難覓人選校對手稿，校對重擔全落在其肩上。

祖父著作等身，離開官場後，仍終日伏案疾書，或整理其當時所撰案牘，或回憶官場所聞，所紀史實，刊印成書，極具歷史價值，所以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一廬存稿》深為時人所愛。後來所寫的詩鐘、自述駢言等在經濟拮据情況下尚可用單行本方式印行，但他晚年巨作《百日淹通集》正文連自註多達三十餘萬字，編輯、校對、印刷等所需人力物力之多，根本極難出版。況且，祖父退休後深居簡出，以詩文自娛，並享高壽，期間所作古文、詩歌、對聯、燈謎，或訂錄成冊，或為單頁手稿等等，洋洋大觀，凡數十萬字，亟須整理出版。家父的意願是希望將祖父作品全部整理排印出版，不過以家父當時的經濟環境，實不足以處理這個龐大項目。其實，祖父亦深知父親處境，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寄家書曾訓示云：「《一廬文詩聯分期選存》一集，……分成十三次，寄交銳兒……至於刊印，二三年未為遲。……留俟他年，必有知者。『他年』二字甚長也。」

家父辭世多年，家人對整理出版祖父遺稿的工作，仍一籌莫展。我雖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但個人專業是工商管理，平時接觸洋文為主。當我從家姊手中接來祖父手稿時，頓感茫無頭緒。對於中國古代文學，我是一個門外漢，更遑論重新編印祖父所寫的清末民初的案牘文章。

家父的刊書遺願，我是責無旁貸，必須要完成。幸好世事多有巧合，一如佛學所說的因緣配合，往往可將不少難題迎刃而解。數年前在一次因緣巧合的機會下，我將祖父的部份作品交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光裕博士過目，並談及出版的心願。張教授看後即聯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黎明釗教授，並徵得中文系程中山博士為主編，負責編纂祖父遺稿的工作。張光裕教授目前是該研究中心的名譽高級研究員。程博士接受此項目後，經過他多年苦心整理，全集終於編成，他更邀請歷史系卜永堅教授協助出版。

當我將此喜訊告知在香港居住的八姑姊及廣州的二位叔叔，彼此都雀躍異常，八姑姊更主動積極搜羅各種遺稿。祖父學生劉鑑波（已八十多歲）亦將他保存的祖父詩、文、對聯等匯集交來，資料更為充實。

這個在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終於在香港中文大學諸位學者和教授的努力下得以完成。希望祖父作品能為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清末民初律法有興趣的學者提供有用的參考。

最後，我謹代表家人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負責和參與整理本書的諸位學者，特別是盡心盡力的項目主持程中山博士。此外，亦非常感謝卜永堅教授的協助，張光裕教授和黎明釗教授的鼎力支持，並感激黃啟深先生以不厭其煩、努力求真的學術研究態度協助此一項目。祖父詩文能有系統地整理成冊出版，不但圓了我家數十年來的願望，而且我們後人也通過本書更深入了解祖父其人其學，受益實在不少。

二零一六年八月，劉可復敬跋於香港大埔寓所。